

两汉循吏如何治政施策

□ 侯 浩



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为“循吏”立传的先河,《二十四史》中有19史为清正干练的古代官员立传,这些人被称为“循吏”或“良吏”。《清史稿》中也有《循吏传》。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的开头便写道:“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尝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他认为,官吏奉公守法、尽职尽责,按法律和规矩施政即能把自己管辖的区域治理好,没有必要实行严刑峻法和苛政暴政,不该对老百姓采取高压态势。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写道:“(循吏)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后汉书》的作者范曄总结循吏治政的特点包括:“移变边俗、仁信笃诚、使人不敢、委任贤良、明发奸伏、吏端禁止、导德齐礼”等。

劝课农桑 移风易俗

西汉黄霸和龚遂是中国古代循吏的典范,“龚黄”是“循吏”的同义词。黄霸在担任颍川太守时,要求下属利用闲置的公共资源养殖鸡、猪等禽畜,用以赡养生活困难的百姓,改善他们的生活。务必使弱势群体在生时有基本生活保障,去世后能妥善安置。黄霸还颁行政策条款,命令治下百姓务必勤劳耕田、种桑养蚕、畜养家用禽畜,他还要求百姓要勤俭过日子,不准用谷物喂马。黄霸勤政为民,得到汉宣帝称赞和赏识,最后还担任西汉丞相,班固评价说:“(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自汉兴,言治民史,以(黄)霸为首。”龚遂在担任渤海太守期间,将“劝课农桑”这项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有成效。龚遂带头勤俭节约,下令郡内每人

都要种1棵榆树、100棵薤、50棵葱、1畦韭菜,每家养2头母猪、5只鸡。规定农民在春夏农忙季节不得离开土地,秋冬季节要把收获的粮食贮藏好,还鼓励农民多采菱角、芡实等以备饥年之需。他还要求那些有刀剑的百姓把刀剑卖了,买牛回家耕田搞生产,这留下了“龚遂守渤海,令民卖刀买牛”的美谈。通过龚遂的精心治理,渤海地区“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兴修水利 造福百姓

水对农业生产重要性不言而喻。两汉循吏在改善百姓用水条件、治理江河灾患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西汉召信臣担任郡太守时,巡视郡内水利资源及水文情况,开通沟渠,兴建起几十处堤坝和闸门,使灌溉的农田“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为了避免百姓因灌溉用水发生纷争,召信臣还制定“用水公约”,刻在石头上,立在田边。东汉任延治理河西地区时,见当地降水较少,便设置水官,修理沟渠,满足百姓用水需求。

东汉王景先是配合王吴采用“堦流法”疏浚“浚仪渠”。公元69年,汉明帝委派王景治理黄河。王景亲自勘测地形,规划河道,爱惜民力,控制成本,使黄河“安澜八百年”。王景在担任庐江太守后,又主持修复了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芍陂”。王景一生都在与水利工程打交道,创造了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光辉业绩。

大兴文教 培养人才

西汉文翁担任蜀郡太守期间发现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于是采取正确引导和正向激励的做法办官学、正民风。一是选派公职人员到长安跟随博士(掌管经学传授的学官)学习经典或律令,文翁节约官府用度,把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蜀地产出的物品,以此馈赠长安博士,请他们好好培养蜀地学生,这些学生学成归蜀后,文翁又授予他们较高官

职,这群人中有的最后还官至太守和刺史。二是在成都创办“石室学官”(今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后来汉武帝下令全国效仿文翁兴办学校,在长安设立“太学”,各地也兴办起官学。三是免除学生的徭役,让他们一心学习,培养了大量人才。四是让学生们入太守府见习工作,每次出巡时带上优秀学子陪同,让他们传达政令,自由出入官府。这些举措让“官学弟子”成为一种受到当地社会认同和尊崇的群体,从百姓到官吏都争相送自家小孩进官学学习,一些有钱富家甚至出钱让自家小孩入学,于是蜀地教育兴盛,从蜀地到长安学习的人和来自齐鲁之地(孔孟之乡)到长安求学的人一样多。《汉书》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仁爱好教化”,其廉洁勤政、崇教尚文,而且勇于创新的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意义。此外,两汉循吏中还有卫飒“修庠序之教”、秦彭“崇好儒雅,敦明庠序”、仇览“农事既毕,乃令子弟群居,还就黉学”,他们都重视发展教育,培养了人才。

依法施政 除暴安民

两汉循吏将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对百姓仁爱有加,对豪强和宗族黑恶势力绝不姑息。东汉任延担任武威太守时,将兵长史(官职名,是郡一级的官员)田紺形成宗族黑恶势力,田紺子弟和门客以暴力侵犯百姓,任延果断逮捕并处决了田紺等五六人。田紺的小儿子田尚居然结数百名亡命之徒在夜间攻击郡城,任延发兵剿灭,终于清除了田家黑恶势力,当地官吏和百姓终于出了胸中一口恶气。由于武威属边境地带,时有外敌入侵骚扰,任延募集兵勇,明确赏罚,设置障碍物防备外敌进攻,遇到外敌入侵便率领募集来的兵勇和民众反击和追讨,使敌人不敢来犯。

东汉王涣在担任太守功曹时,处理政事不怕得罪富豪家族和世家大户。在担任温县县令时,在多番细致谋划后将县内的奸邪狡诈之徒一网打尽,境内终

于平安清静。担任兖州刺史后,“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在担任洛阳令后,办案严谨,宽猛相济,对于疑难案件及法理难平者,探寻本来面目,尽力还以公正,揭发奸隐之事,深受官员百姓称赞,被誉为有神机妙算。

清正家风 清廉为官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源自《易经》的名言是许多家族的家训,阐明了家风与家族兴衰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

西汉朱邑生活节俭,将自己的俸禄和政府的赏赐用来供养亲族和邻居,家中无多余钱财。东汉孟尝祖上三代人都是郡的官吏,都在祸乱中守节而死,孟家三代人用生命把精忠报国情怀熔铸到家族精神中,因此孟尝小时候就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清正的操行,为官后敢于为受冤屈的妇女辩白,澄清真相,还人公道。东汉刘宠在父亲刘丕的精心教育下学有所成,后被举荐为官,他在担任三公后仍然节俭朴素,家中不积蓄钱财。东汉章恢的父亲童仲玉在严重灾荒之年,把全部家产拿出来赈济亲族和乡邻,上百人因此存活下来。童恢和弟弟童翊在父亲的影响下都清廉从政,善待百姓,公平执法,深受百姓爱戴。

两汉循吏在治政施策过程中把精力放在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富民安邦、大兴文教、移风易俗等工作上,其结果是“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他们在任的时候鼓励生产,粮食丰收,人口大量增加,百姓安居乐业;他们因交流任职或提拔而离开原地后,百姓思念;他们在世的时候受到百姓的赞誉,如西汉时召信臣治理南阳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水排”的发明者东汉杜诗在治理南阳时“省爱民役”,南阳人称赞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也是“父母官”一说的由来;他们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提拔,多人最终位列公卿,在历史舞台上更大的作为;他们去世后国家层面有赏赐和褒扬,百姓或群起祭奠,或立祠修庙,后世纪念不断。

《祭侄文稿》：厚重的历史书写

□ 陈 亮

唐至德三年(公元758年)9月3日,秋风肃杀,再过数日,就到传统佳节——重阳节,虽是战乱,可登高望远观赏菊花,饮菊花酒吃重阳糕等习俗却早已深入人心。自公元755年12月爆发“安史之乱”至此时已有数年,而自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等率军民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达十月之久,抗击、牵制安禄山叛军,为平叛争取了组织反攻的宝贵时间,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而49岁的颜真卿纵观天下大局,却没有心情准备过节,他坐在书桌前,要为在战争中惨遭毒手的侄子颜季明写一篇祭文,饱蘸浓墨后提笔写下“维乾元元年”……

安史之乱爆发时,海内承平日久,几代百姓都没有见过战争,听说范阳兵起,社会震荡。叛军所到之处,河北诸郡纷纷倒戈,唯有时任平原郡太守颜真卿和常山郡太守颜杲卿兄弟二人坚贞不屈,带领有限的力量抗击叛乱。颜杲卿的儿子颜季明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他却早早地参与战事,并在平原郡和常山郡之间往来通报消息,传递情报。颜家素来就是名门望族,自西晋迄唐,诗书传家,家训、书法历代以来都是当时的翘楚。五世祖颜之推携全族迁往陕西长安,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开中国古代家训之先河。颜氏子孙循儒家训,皆为忠心报国、刚正不屈的忠烈之士。

公元756年正月,叛军史思明所部攻陷常山。颜杲卿与其子颜季明被叛军俘虏,坚决不肯投降,父子二人及全家三十多口全部遇害。因为战乱,直到惨案发生两年之后,颜真卿才有机会派侄子颜泉明去为亲人收尸,极度悲愤的颜真卿为祭奠罹难的侄子颜季明,亲自书写了这篇祭文。祭文全文23行,234个字,脱漏一处,涂改14处。每个字都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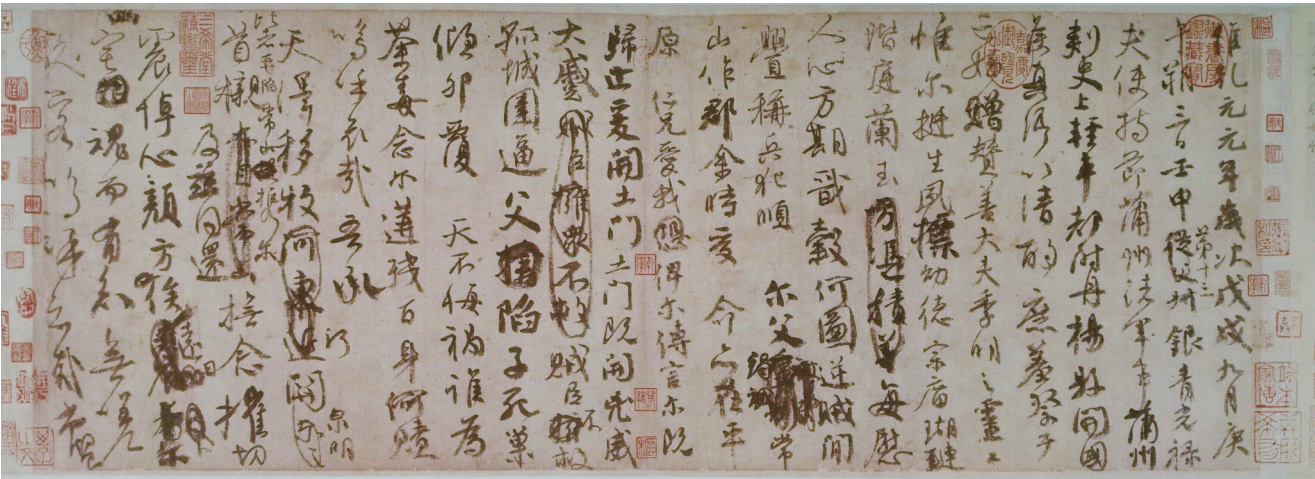
如千钧,力透纸背。书写祭文全文颜真卿一气呵成,只蘸墨七次。

《祭侄文稿》刚开始书写时,颜真卿一笔贯之,墨色由重而轻,点画凝重,由初而细。当写到“归”时,颜真卿多么希望侄子颜季明回到身边,家族中大有希望的如“宗庙瑚璉,阶庭兰玉”的佼佼者却惨遭毒手,而自己却只能在两年以后用简单的“清酌庶羞”来祭奠,其情绪强烈变化,墨色转为极其浓润。接着写到“何图逆贼间起,称兵犯顺”时,提及罪魁祸首,“何图”两个字突然间放大,颜真卿悲愤之情力透纸背。接着写到“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时,其心情再也不能平复,其墨色是全文中最为浓厚的,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跃然纸上。而对颜杲卿和颜季明父子遇难的原因是“贼臣不救”,颜真卿对同僚的卑鄙之心极端愤怒,极端鄙视,颜真卿写了两遍,涂去一句。祭文书写到最后,颜真卿悲恸之情已无法掌控,由开始书写的行草变为大草,如高山瀑布,率性而为,飞流直下。其情感交织而产生的笔墨效果使作

品达到艺术的巅峰状态。这一墨法的艺术效果与颜真卿当时的悲恸恰好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

《祭侄文稿》为历代书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苏轼的《寒食帖》并称为中国书法行书的巅峰之作,是后世每位研习书法的学子必须临摹的法帖。然而,它绝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书法作品和一次普普通通的书法创作。它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气血命脉和精神力量,它是一次厚重的历史书写,真实记录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王朝由盛转衰。它更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不怕牺牲、不畏强暴的精神书写。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为了理想、为了精神追求而不惜牺牲、慷慨赴死的仁人志士。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叛军李希烈攻陷汝州,围困洛阳。75岁的颜真卿在人生暮年被任命为宣慰使,深入敌营力图安抚说服叛军,却不幸被囚禁数年。贞元元年(公元785年),颜真卿被转移到蔡州龙兴寺囚禁,他用标准的楷书留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纸书帖《移



祭侄文稿

中国古代有作为的皇帝不少,但有所作为又崇尚节俭的皇帝并不多,西汉文帝刘恒就是一位。

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7岁被封为代王。因为刘恒的母亲薄氏一直是不被宠的“诸姬”,从没有升到刘邦“夫人”的地位,所以其母子才躲过吕后的迫害,平安地活下来。公元前188年,汉惠帝英年早逝,吕后专政。公元前180年,吕后死,宫廷发生变乱,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夷灭诸吕,拥戴刘恒登上王位。由于早年的生活经历,使刘恒养成了低调、仁厚、节俭的处事风格。单就节俭来讲,他在位23年,以上率下,一以贯之,这是很多帝王做不到的。

《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孝文帝在位23年,“官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官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是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服御”是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封建社会帝王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然而文帝当皇帝23年,居然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但凡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这与秦始皇的骄奢淫逸,大兴土木,强征劳役,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墓,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古代皇帝住的宫殿,大都要修又大又漂亮的露台。汉文帝也打造一个露台,他找到工匠,让他们算算要花多少钱。“召匠计之,直百金。”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文帝听了后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官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就是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继承了先帝留下来的官室,时常担心有辱于先帝,还建造露台干什么呢?

文帝的穿衣很是朴素,“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今衣不得曳地,帟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古书中常见到“绨”这个字,绨是厚缯,质地较粗,也就是粗布袍子。汉文帝不仅自己穿粗布衣服,后官也是朴素服饰。当时,贵夫人们长衣拖地是很时髦的,为了节约布料,即使给自己最宠幸的慎夫人,也不准衣服长得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不带花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作出榜样。

文帝还打破封建社会长期的厚葬制度,在他死前,亲自安排自己的丧事。他在遗诏中痛斥了厚葬的陋俗,要求自己从简办丧事,对待自己的归宿“霸陵”,明确要求“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陪葬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墓冢,要节俭,不要烦扰百姓。“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霸陵要按照山川原来的样子,因地制宜,建一座简陋的坟地,不要因为给自己建墓而大兴土木,改变了山川原来的模样。汉文帝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官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后来赤眉军攻进长安,许多皇帝的陵墓都被挖了,唯独没动汉文帝的陵墓,因为他们知道里面没有啥贵重东西。

北宋文学家吴炯在《五总志》中,还记载了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的故事。草鞋最早的名字叫“屨”,由于制作草鞋的材料

崇尚节俭的汉文帝

□ 吉炳伟



以草和麻为主,非常经济,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民百姓都能自备,汉代称之为“不藉”。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已经沦为贫民的穿着,而汉文帝刘恒以“履不藉以视朝”,就是说他们穿着草鞋上殿办公,作了节俭的表率。这个故事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也许是后人的杜撰,但放到汉文帝身上,应该是可信的。

汉文帝不仅节俭,还关心百姓的疾苦,刚当皇帝不久,就下令,由国家供养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90岁以上的老人,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绵,给他们做衣服。在位期间,轻徭薄赋,甚至12年免收全国田赋。春耕时,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

汉文帝加强中央集权,镇压叛乱,巩固国防,废除肉刑、连坐等严刑苛法,重视民生,减省租赋,虚心纳谏,重用人才,励精图治,使汉朝从国家初定逐步走向繁荣昌盛,为后来汉武帝的横扫四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

谈起汉文帝的节俭,有人认为是当时国家太穷,其实不然。据史料记载,当时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不清,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的粮食一年年往上堆,都堆到粮仓外面来了。因此,司马迁高度评价汉文帝说“德至盛焉”“岂不仁哉”!



汉文帝刘恒